

關於汝窯青瓷舟形杯

■ 謝明良

汝窯窯址在今河南省寶豐清涼寺。關於汝窯的性質，也就是其是否即北宋（960-1127）官窯？抑或只是民間窯場進獻的貢瓷？迄今未有定論，但也有些周邊訊息可供參考。如南宋陸游（1125-1210）《老學庵筆記》談到脫穎而出的汝窯是北宋宮廷喜愛的器用；同為南宋人的周輝（1126-1198）《清波雜志》另提到由官方參與主導的汝窯瓷，需經朝廷挑揀之後方許民間販售。結合傳世汝窯的外觀特徵，可以想見汝窯溫潤如玉的青釉應該是北宋內廷成員賞鑑的重點之一，而整體施滿釉只留下器底幾處芝麻般細小支釘痕，或可說是不欲陶瓷暴露無釉的澀胎而予裹釉支燒，正是北宋宮廷品味的反映。南宋官窯常見施滿釉以支釘支燒的青瓷製品，很可能也和北宋宮廷賞玩青釉並追求不露胎的滿釉效果有關。



圖1 北宋 a. 施加金繕的汝窯青瓷杯 b. 底部 長14.5，寬10.1，高2.9公分 大英博物館保管 取自該館官網：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PDF-76，檢索日期：2021年7月13日。



圖2 清 乾隆 《燭功影色》圖冊所見金繕的「宋汝窯舟形筆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汝窯燒瓷進貢的時間大約是在十一世紀後期至十二世紀初北宋晚期，前引撰成於紹熙三年（1192）《清波雜志》已有汝窯「近尤難得」之嘆；收錄在南宋周密（1232-1298）《武林舊事》的一份臣僚在紹興年間進呈高宗的禮品清單中包括了十多件汝窯製品，則說明了當時汝窯已被做為一種貴重的禮品獻呈帝王，考古發掘也表明杭州紹定五年（1232）崩逝的寧宗皇后楊氏（諡曰恭聖仁烈）居宅水池遺址出土有汝窯青瓷梅瓶殘片。在宋代被視為名品，之後又被明代人列入所謂五大名窯之一的汝窯數量很少，在1980年代寶豐清涼寺窯址發現之前，其傳世數量不過百件，並且多屬清宮舊藏，藏品主要見於臺灣和中國兩個故宮。本文所擬介紹的汝窯舟形杯分別見於清宮傳世品和窯址發掘標本，前者計有三件，其中一件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皮藏品，餘二件是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所保管大維德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舊藏品。過去典藏單位多依據大維德夫人的回憶，認為大維德基金會的清宮傳世名瓷乃是大維德爵士購自慈禧太后（1835-1908）為籌募資金而提列鹽業銀行的抵押品。¹不過，從1924年分別代表遜帝溥儀（1906-1967）和貸款銀行，即由內務大臣鄭孝胥（1860-1938）與鹽業銀行經理岳乾齋所簽訂的借貸



圖3 北宋 a. 汝窯雙魚紋橢圓杯 b. 底部 c. 局部 長14.2，寬9.7，高2.8公分 大英博物館保管 取自該館官網：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PDF-A-60，檢索日期：2021年7月13日。

合同可知，1927 年大維德爵士購自鹽業銀行的計約四十件清宮傳世古瓷，其實應該是 1924 年清宮提供銀行抵押品當中的一批，² 此時距西太后辭世已十多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汝窯舟形杯（故瓷 017849），曾經在 1935 年赴英國倫敦參展，當時定名為「宋汝窯卵青橢圓洗」；³ 大維德基金會舊藏兩件汝窯舟形杯（編號 PDF 76 和編號 PDF A60），也是被定名為筆洗（brush washer）。⁴ 說來實在很巧，大維德基金會舊藏的這兩件汝窯舟形杯竟然和現藏國立故宮博物

院的乾隆朝（1735-1796）圖譜中的圖像有著密不可分的親緣關係，茲敘說如下。

大維德基金會舊藏汝窯舟形杯(PDF 76)

造型呈兩頭微斂內收的橢圓式獨木舟形，長邊 14.5 公分。（圖 1）模製成形，整體施青瓷釉，背底圓形如鏡面的坳底有三只細小如芝麻的掙釘，露胎處呈香灰色。余佩瑾依據清宮內務府活計清檔，考察了乾隆皇帝幾次揀選清宮庋藏名瓷或銅器授意畫師圖繪成冊，既確認了圖冊的繪製年代，也指出完成於乾隆二十一



圖4 清 乾隆 a. 《挺塲流光》圖冊所見的「宋汝窯舟形筆洗」 b.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年至二十二年（1756-1757）的《燔功彰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所收錄的「宋汝窯舟形筆洗」（圖2），應即前引大維德舊藏舟形杯（見圖1），其主要依據是大維德舟形杯杯口一處金繕痕跡，正和清代畫師所寫實圖繪的修補處一致。⁵筆者同意這個看法，同時想強調指出，儘管《燔功彰色》圖繪的大維德基金會舊藏汝窯舟形杯上所見補金的實際施作年代不明，但絕不晚於圖冊編成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一有年代

下限可考的陶瓷金繕實例極為珍貴，因為其是筆者所知全球範圍年代最早且可實證的陶瓷金補實例。⁶

圖冊舟形洗下方另有乾隆皇帝題識，指出：該洗「高一寸」（3.2公分）、「深八分」（2.56公分）、「口縱三寸二分」（10.24公分）、「橫四寸六分」（14.72公分），「青色冰紋」（青釉帶開片）。其丈量尺寸和前引大維德藏舟形杯高2.9、橫長14.5、寬10.1公分雖略有出入，但仍在容許的誤差範圍之內。賞鑑陶瓷幾乎不放過任何細節的乾隆皇帝另觀察到筆洗「中有如意暗花二，底微坳有三釘」。對照大維德藏舟形杯可知，所謂「如意暗花」其實是內底所飾兩條頭部相對鯰魚的雙眼，而微坳有三釘指的正是洗底所見內凹呈圓形小鏡面，亦即坳底的三只芝麻狀支釘痕。

大維德基金會舊藏汝窯舟形杯（PDF A60）

造型略同圖1，尺寸高2.8、橫長14.2、寬9.7公分，整體滿釉，外底鏡面般坳足處有三只芝麻狀支釘痕。（圖3）引起筆者留意的是，該杯口沿近內收舟首部位可見可能是因磕傷而予補修的痕跡，補修原料成分不明，但從補修位置以及填充原料再予彌平的補修痕之形狀看來，極有可能就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另一冊陶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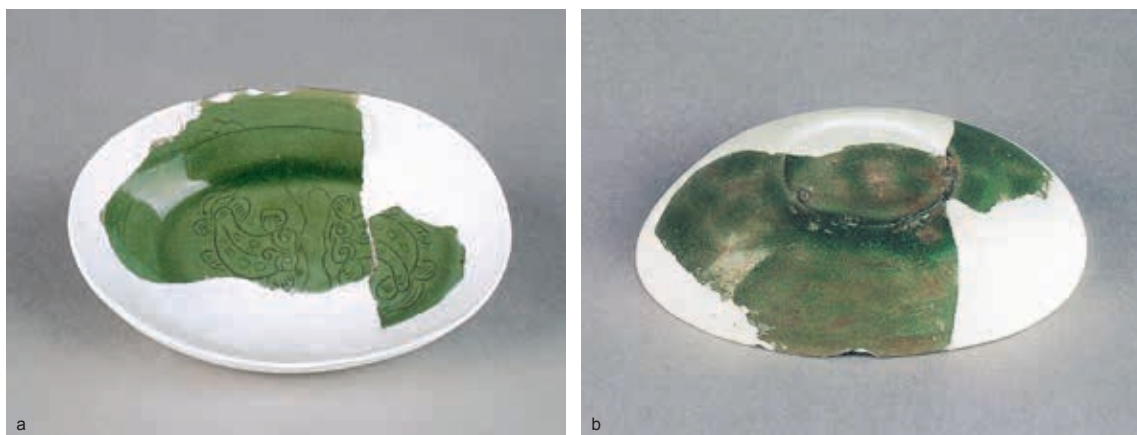


圖5 a. 汝窯對魚紋舟形杯 b. 底部 長14，寬10.3，高3公分 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寶豐清涼寺汝窯》，彩版29之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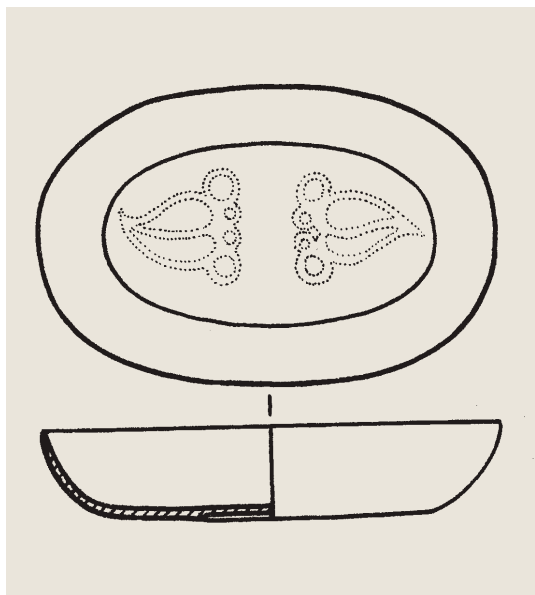


圖6 汝窯對魚紋舟形杯 線繪圖 長14.8，寬9.4，高2.8公分 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寶豐清涼寺汝窯》，頁85，圖55之12。

譜，即《埏埴流光》中帶有同樣補修痕的「宋汝窯舟形筆洗」所臨摹的原件。（圖4）其次，相對於該約略位置於時鐘2點至3點鐘之間的補修，該舟形洗外口沿之7點至8點鐘位置另見一可能因磕碰而出現的裂罅（見圖3之c），而其呈「Y」的裂罅走向，則被清宮畫家寫實

地記錄下來（見圖4之b），此可再次表明《埏埴流光》「宋汝窯舟形筆洗」是對大維德舟形杯（PDF A60）的寫真。《埏埴流光》圖譜繪製於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一年（1756），據此可知大維德基金會藏該舟形杯口沿的補修不晚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

圖像下方有乾隆御題，談到舟形杯的尺寸：高八分（2.56公分）、深七分（2.24公分）、寬三寸（9.6公分）、長四寸五分（14.4公分）；並提到其釉色青中偏卵白色調，帶開片，坳底處有三支釘、釉調與同圖譜的「宋汝窯磬口洗」相近，但胎相對較薄。乾隆皇帝對於該舟形杯的外觀描述可謂詳細，不過就如《燔功彰色》對「宋汝窯舟形筆洗」的題識般（見圖2），他在《埏埴流光》中也忽略了舟形杯口沿的傷缺補修。《周禮·考工記》載陶瓷若有變形傷缺（髻罅）不入於市，看來乾隆皇帝顯然意識到此一古訓，⁷對於揀選編入圖譜之珍貴汝瓷的傷缺仍心存芥蒂，所以刻意略去不予提及。另一方面，相對於《燔功彰色》提到後歸大維德基金會藏的舟形杯內底有「如意暗花」，《埏埴流光》則對杯之內底未置一詞，當今典藏單位也未有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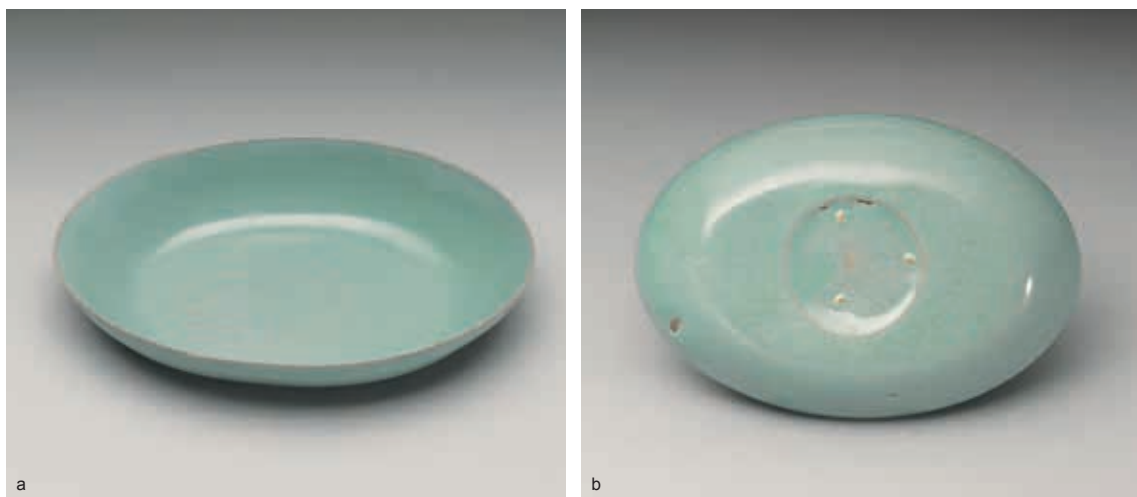


圖7 北宋 a. 汝窯卵青橢圓杯 b. 底部 長14.2，寬9.8，高2.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唐 a. 鑿金花鳥雙魚紋荷葉形帶足銀杯 b. 側面 口徑10~14.7公分 西安博物院藏 取自深圳博物館、河南博物院編，《盛世側影：河南博物院藏漢唐文物精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113，圖77。

何涉及。儘管如此，我們從寶豐清涼寺遺址出土標本可知，汝窯此類舟形杯杯內底多飾對魚紋，如報告書所分類的「B型洗」（圖5）或「C型洗」（圖6）杯心均有印花雙魚。⁸事實上，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同式清宮傳世汝窯舟形杯（圖7）杯心釉下亦有難以名狀的印紋樣，但1970年代出版的《故宮宋瓷圖錄》還是辨識出其「器心有印花紋飾，狀似兩尾相對的青蛙」，⁹這不由得讓筆者好奇所謂「青蛙」印紋，會不會就是清涼寺遺址「C型洗」（見圖6）內底所見呈兩頭相向的大目魚？

這樣看來，《埏埴流光》圖繪的「宋汝窯舟形筆洗」，也就是筆者推測後歸大維德

基金會藏現由大英博物館保管的汝窯舟形杯（見圖3），其杯心不排除原亦帶印花魚飾，但或因印紋較淺且被青釉所覆蓋而致難以辨識？汝窯舟形杯以內模成形並飾紋一事，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此一工藝設計意匠是否來自唐宋時期內底飾雙鯢魚的金銀器，如河南三門峽市出土的唐代鑿花花鳥雙魚四花口銀杯（圖8），即為一例。後者俯視呈橢圓舟形，但口沿呈四花，杯底下置外敞的圈足。浙江上林湖越窯址所出青釉臥足盤（A型），盤內亦刻劃雙鯢魚。（圖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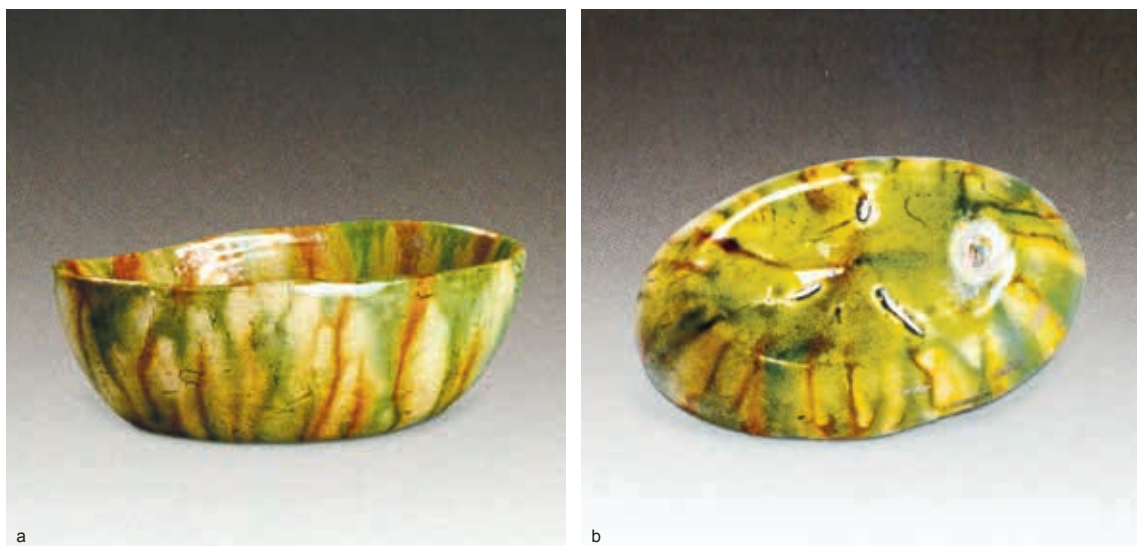


圖10 唐 神龍二年 a. 三彩鉛釉陶舟形杯 b. 底部 口徑長13，寬7.5，高4.3公分 懿德太子李重潤墓出土 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乾陵博物館編著，《唐懿德太子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圖版41之1、2。

從酒杯到筆洗

自乾隆皇帝以迄當今學界都將本文所介紹的汝窯舟形杯稱作洗或筆洗。這多少是因為其簡約雅緻的造型和與之相應的尺寸，很自然的會讓人聯想到文房筆洗。不過，這類被乾隆皇帝命名為「舟形洗」的汝瓷在其產燒的北宋時段並非文房用具，而是飲宴用的酒杯。雖然乾隆皇帝不止一次地自以為知音而擅自改變清宮舊藏古物的用途，也頗得意自身的名物考證功底，但將汝窯舟形杯視為筆洗的說法很有可能只是單純地沿用了前朝人的鑑定結果，不過此均還有待日後的調查來釐清。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陶瓷舟形杯的年代至少可上溯唐代，如被武則天下令仗殺，後來平反改葬陪葬乾陵的神龍二年（706）懿德太子李重潤墓（號墓為陵）就出土了三彩鉛釉陶舟形杯，杯施滿釉，底有三細長支燒痕。（圖10）陶瓷之外，北京故宮博物院也收藏了一件外壁陰刻人物的唐代青玉舟形杯（圖11）；內蒙敖漢旗李家營子一號墓則出土了舟形銀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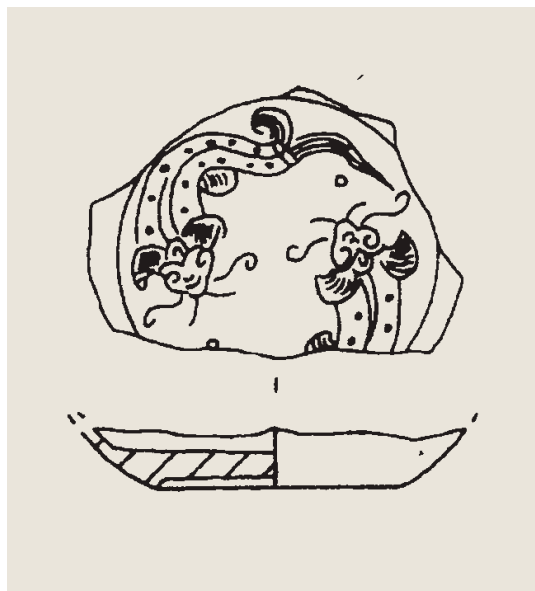


圖9 雙鯉魚青釉臥足盤 長4.4，殘高1.4公分 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窯址出土 取自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98，圖52之4。

（圖12），發掘報告書載銀杯原帶圈足，¹⁰可惜未公布底部圖，詳情不得而知。齊東方認為李家營子墓出土該舟形銀杯是七世紀後半至八世紀中期的粟特銀器；¹¹孫機也同意上引舟形銀



圖11 唐 青玉人物圖橢圓杯 長14.9，寬8.5，高4.8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中國玉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玉器全集·第五卷·隋·唐一明》，香港：錦年國際有限公司，1994，頁20，圖30。



圖12 唐 橢圓銀杯 長18.5公分 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子1號墓出土 取自邵國田主編，《敖漢文物精華》，呼倫貝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頁97，上圖。

杯是粟特銀器，但認為李家營子墓應是唐代突厥墓，年代不超出西元八世紀。¹²

另一方面，公私藏品也頻見薩珊或粟特舟形銀杯（圖13），其中一件外壁黏附平織麻

布，內壁雕刻銘文（圖14），從其字形酷似馬爾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粟特銀器》一書所揭示銀碗上的粟特文（圖15），看來可能也是粟特銀器。自馬爾沙克1970年代的上引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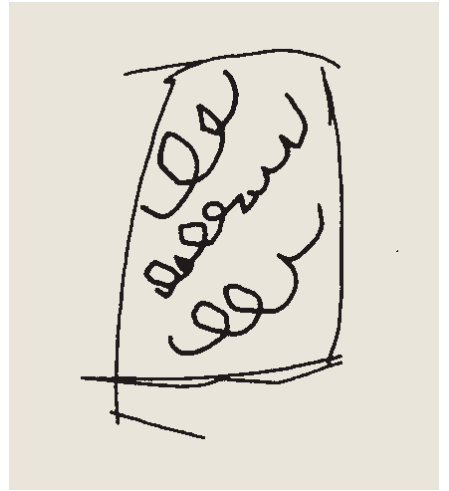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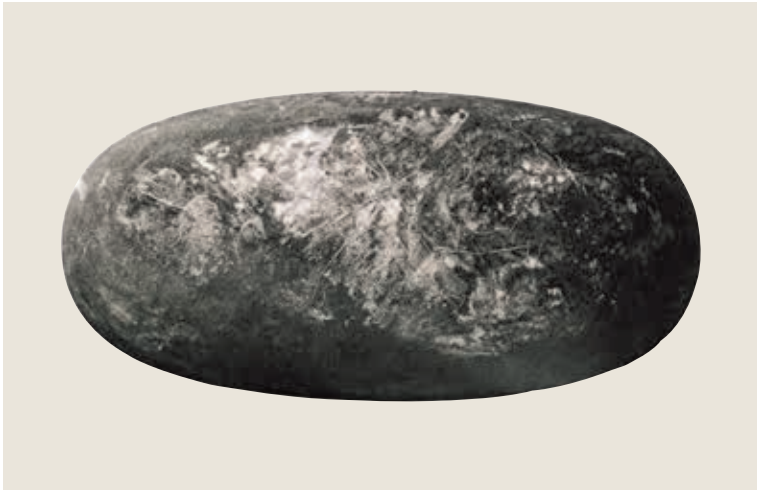


圖14 粟特銀製卮形杯及文字線描 長25.5，寬12.2公分 日本東京私人藏 取自田邊勝美，《シルクロードの貴金屬工藝》，頁42，圖25。



圖13 伊朗薩珊王朝晚期 孔雀紋鎏金白銅卮形杯 長17.2，寬12公分 日本大阪私人藏 取自田邊勝美，《シルクロードの貴金屬工藝》，東京：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1981，頁45，圖29。



圖15 粟特銀碗及粟特文線描 取自鮑里斯·艾里克·馬爾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著（李梅田等譯），《粟特銀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49，圖21上。



圖16 持卮形杯飲酒圖片 治肯特壁畫 取自鮑里斯·艾里克·馬爾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著（李梅田等譯），《粟特銀器》，頁45，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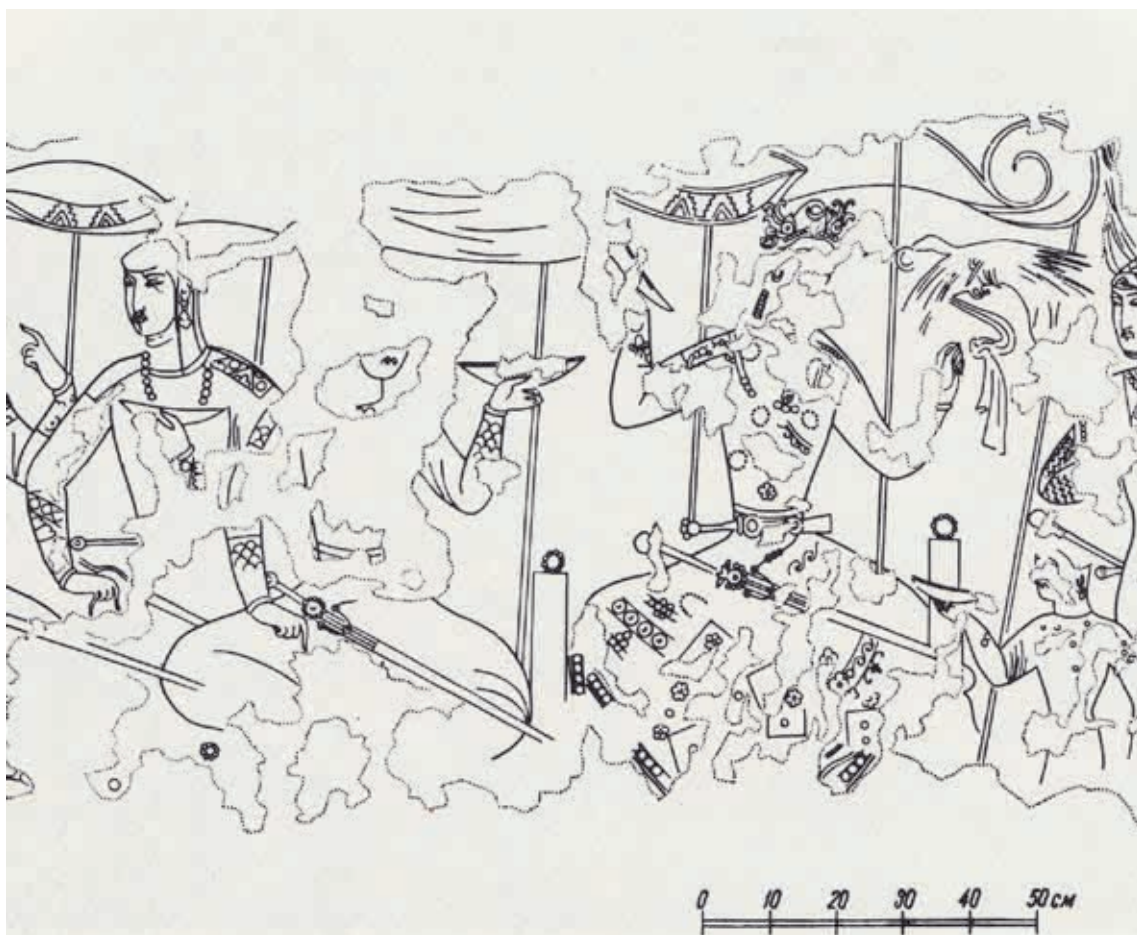


圖17 持舟形杯飲酒圖片 治肯特壁畫 線描圖 取自Belenitskii, A. M., B. I. Marshak, and Mark J. Dresden. *Sogdian Painting: 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121, fig. 53.



圖18 銀帶把杯線繪圖 高11.6公分 俄羅斯Perm地區Gutova出土 俄羅斯埃爾米塔日博物館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藏 取自鮑里斯·艾里克·馬爾沙克 (Boris Ilich Marshak) 著 (李梅田等譯), 《粟特銀器》, 頁100, 附圖28。

著圖示的中亞撒馬爾罕 (Samarkand) 片治肯特 (Panjikent) 壁畫中的人物手持舟形杯的飲宴場景 (圖 16), 之後他參與編寫的粟特壁畫圖集也揭示了其線繪臨寫。(圖 17) 從一件同氏所分梳的流派 A 帶把杯指墊所見推測是酒神狄奧尼索斯 (Dionysos) 飲酒圖像, 可以清楚看到是以舟形杯弧度內收, 即相當於舟首或尾部位就口飲用 (圖 18), 俄羅斯 Perm 地區 Tomyz 出土的同式粟特帶把杯指墊亦見同款持杯飲酒圖像 (圖 19), 經由粟特人愛用的舟形酒杯及其持拿就口的使用方式, 可以想像宋代的人們以



圖19 8世紀 把杯指墊所見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os）飲酒圖像 俄羅斯埃爾米塔日博物館藏 取自Boris Ilich Marshak著（田邊勝美譯），〈ソグドの美術〉，收入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15卷・中央アジア》，東京：小學館，1999，頁218，圖157。

汝窯卮形杯飲酒的身影。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我們已然習慣在名品圖錄或博物館展廳觀賞氣質高逸的汝窯青瓷，然而不僅卮形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可注入溫水以保暖盛酒注壺的溫碗，或清涼寺窯址出土的用以貯酒的梅瓶等製品，都是當時實用的酒器。

關於卮形杯的源流，如德黑蘭考古美術館藏 Deleman 出土之相對年代在六至七世紀薩珊王朝錘揲製銀杯（圖 20）；¹³ 伊朗蘇薩（Susa）遺址和馬爾延（Malyan）遺址出土的銀和銅卮

形杯，可從伴出遺物推定其相對年代在薩珊王朝（224-651）晚期。由於古代近東未見標準的橢圓形卮形杯式，因此也有認為出現於六至七世紀薩珊王朝的卮形杯乃是受到北魏或中亞之所謂中國文化圈的影響才出現的，¹⁴ 後一說法顯然和山西省大同北魏正始元年（504）封和突墓等幾座北魏墓出土的銀耳杯有關。（圖 21）封和突墓銀耳杯杯耳部位飾聯珠紋，雖然報告書認為該耳杯是在中國傳統杯式基礎上的創作，¹⁵ 但馬雍對其製造地點有所保留，¹⁶ Prudence O.



圖22 薩珊王朝銀杯 外口沿帶巴列維文刻銘 長24.5，寬11.9公分 日本京都私人藏 取自田邊勝美，《シルクロードの貴金屬工藝》，頁43，圖27。



圖20 6至7世紀 銀製舟形杯 長21，高4.5公分 Dalaman地方出土 伊朗德黑蘭考古美術館藏 取自深井晉司，《ベルシア古美術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8，頁122，圖75。



圖21 帶橢圓形圈足的銀耳杯 長12.9，寬7.2，最高4.3公分 山西省大同封和突墓出土 取自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塔塔台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8期，圖版壹之2。

Harper 則認為其可能是巴克特里亞（Bactria）的製品，並且提示了薩珊王朝舟形杯有可能是借鑑並修改了中國傳統耳杯造型的產物。¹⁷

盛唐時期出現的舟形杯和中國西元前五世紀戰國時代以來的耳杯也就是羽觴是否有關？目前仍難確認，不過宋代汝窯青瓷舟形杯的原型可上溯唐代，而唐代舟形杯的祖型又和中亞或西亞的金銀器有關，考慮到汝窯舟形杯以內模模製成形並飾紋，我認為其祖型極可能來自金銀器。有趣的是，個別學者釋讀指出京都私人藏的一件薩珊王朝舟形銀杯上所刻巴列維文字有 *mKwK* 即「舟形碗」自銘（圖22），¹⁸ 其和乾隆朝《燔功彰色》、《埏埴流光》所見「舟形筆洗」大概都是依據器物外形所給予的直接稱謂。筆者在驚艷汝窯舟形杯靈活地擷取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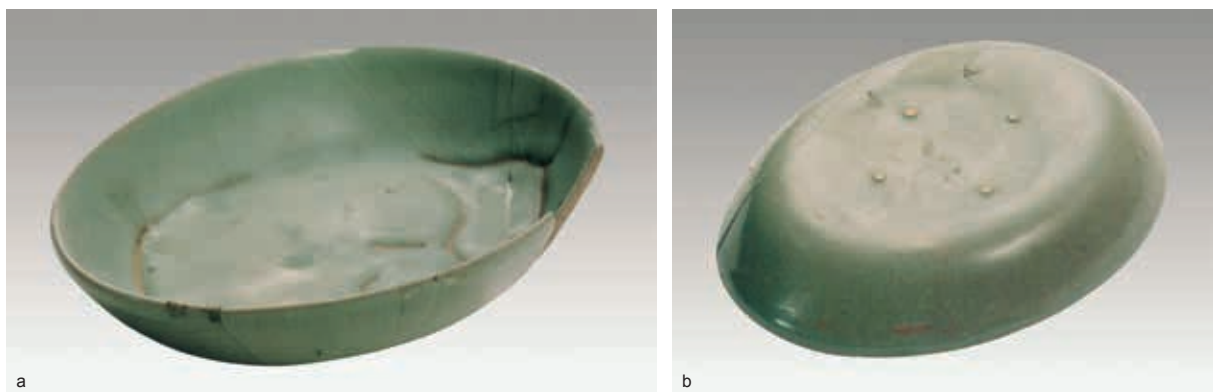


圖23 a. 張公巷窯青瓷舟形杯 b. 底部 長14.1，寬10.5，高2.5公分 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汝窯與張公巷窯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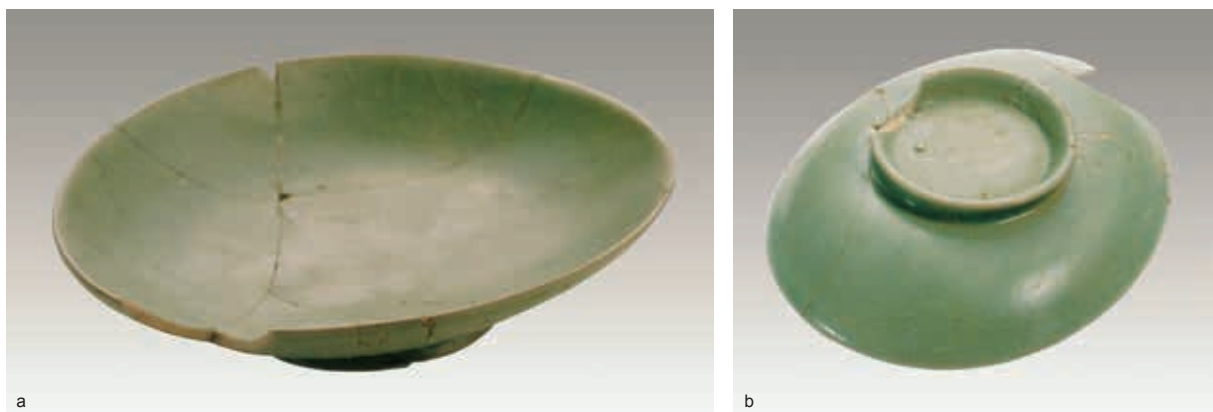


圖24 a. 張公巷窯青瓷舟形杯 b. 底部 長13.4，寬11.1，高2.8，底徑5.8公分 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汝窯與張公巷窯出土瓷器》，頁127。

質材工藝品器式的同時，很自然地再次憶起著名的汝窯紙槌瓶式也是來自西亞的玻璃瓶。

無論如何，俯視呈橢圓的平底、坳底甚至帶足的舟形杯是唐宋時代人們愛用的酒器之一，唐代張祐（?-853）《貴家郎》詩「醉把金船擲，閑敲玉蹬游」的金船應即金或金屬製的舟形杯；蘇軾《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破陣酒戒》詩「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是用舟形玉杯罰酒；陸游《即席》詩也提到「一吸已乾雙玉船」的豪放男。不過，宋代蒸餾白酒仍未普及，一般多是飲用和今日日本清酒相近之酒精度約在十多度的釀造米酒，就此而言，汝窯舟形杯的

大小尺寸應該說是相當合用的飲酒器。汝窯之外，汝州市張公巷窯也燒製有青瓷舟形杯，所見有二式，一式底部坳足較大的鏡面分布四只白色圓形小支釘（圖23），另一式是在杯底置略往外翻的圈足，足內有三只白色圓形小支釘（圖24），後者是薩珊、粟特和唐代金銀器常見的器式（見圖8），也是晚唐九世紀越窯青瓷或北方白瓷等陶瓷製品追逐模倣的時尚器形。

文末，筆者想再次強調指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燿功彰色》和《埏埴流光》中所圖繪的「宋汝窯舟形筆洗」，乃是十八世紀宮廷畫家針對大維德舊藏（PDF 76、PDF A60）原本度

藏於清宮汝窯舟形杯的寫實臨摹，其原是多寶格中成套的寶物，而《燔功彰色》汝窯舟形杯所見金補則是目前所知有年代可考最早的一件金繕陶瓷器。從劉體仁（1617-1676）《七頌堂識小錄》：「浮月杯，陶杯也，口微缺，以金

銅之，酒滿則一月晶浮酒面」，可知中國區域早在十七世紀已將金補處視為如月般的景色吟味賞鑑。相對於乾隆皇帝對此視若無睹，日本區域茶人則樂於賞鑑補修部位的殘缺情趣，是值得再予探究的有趣議題。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註釋：

1. Lady David, 〈Sir Percival David〉, 收入セゾン美術館等編, 《中国陶磁の至宝 英国デイヴィッド・コレクション展》圖錄(大阪: 讀賣新聞大阪本社, 1998), 頁 22; 畢宗陶 (Stacey Pierson), 《中國陶瓷在英國 (1560-1960) 藏家、藏品與博物館》(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17), 頁 101。
2. 傅壹強, 〈溥儀出宮前夕宮廷文物的抵押與流失〉, 《黑龍江史志》, 2013 年 15 期, 頁 41-42 轉頁 44。
3.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編,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展覽會出品圖說·第 2 冊·瓷器》(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36), 圖 23。
4.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Ru, Guan, Jun, Guangdong and Yixing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9), 44, pl. 76; 45, pl. 77.
5. 余佩瑾, 〈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問題〉, 《故宮學術季刊》, 22 卷 2 期 (2004 冬), 頁 141; 以及〈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鑑賞〉, 收入同氏主編, 《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2012), 頁 32。
6. 謝明良, 《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 (修訂版)》(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20), 頁 133-134。
7. 謝明良, 〈乾隆的陶瓷鑑賞觀〉, 《故宮學術季刊》, 21 卷 2 期 (2003 冬), 後收入同氏, 《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 允晨文化, 2007), 頁 255-256。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寶豐清涼寺汝窯》(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8), 頁 85, 圖 55 之 12; 頁 127, 圖 84 之 10。
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故宮宋瓷圖錄·汝窯·官窯·鈞窯》(東京: 學習研究社, 1973), 圖 22「卵青圓洗」的解說。
10. 敖漢旗文化館 (邵國田), 〈敖漢旗李家營子出土的金銀器〉, 《考古》, 1978 年 2 期, 頁 117。
11. 齊東方, 《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頁 329。
12. 孫機, 〈內蒙古出土的突厥與突厥式金銀器〉, 《文物》, 1993 年 8 期, 後收入同氏, 《仰觀集》(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頁 285。
13. 深井晉司, 〈鍍金銀器八曲長杯〉, 收入同氏, 《ペルシア古美術研究・ガラス器・金属器》(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67), 頁 122-123。
14. Miho Museum, 《古代オリエント美術の愉しみ》(滋賀: Miho Museum 友の会, 2016), 頁 201-202。
15. 馬玉基, 〈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簡報〉, 《文物》, 1983 年 8 期, 頁 2。
16. 馬雍, 〈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銀盤〉, 《文物》, 1983 年 8 期, 頁 11。
17. Prudence O. Harper, "Boat-Shaped of the Sasanian Period," *Iranica Antiqua* vol. XXIII (1988): 336-337.
18. Prudence O. Harper, "Boat-Shaped of the Sasanian Period," 338. 轉引 Philippe Gignoux, "Éléments de prosopographie: II, Les possesseurs de coupes sasanides," *Studia Iranica* 13, no. 39 (1984) .